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毛泽东时代

的中国

二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推荐重点图书

何蓬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1949 – 1976)

第 二 卷

何 蓬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3 • 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走自己的路	1
一、序幕即将拉开	1
二、向现代科学进军	3
三、苏联的弯路,你还想走?	9
四、反冒进与反“右倾保守”.....	13
五、里程碑式的八大.....	22
六、“新经济政策”.....	28
第二章 从和风细雨到暴风骤雨	38
一、多事之秋.....	38
二、整风的动员.....	42
三、党外人士的意见.....	48
四、从整风转向反右派.....	56
五、发动反右派斗争.....	61
六、反右派斗争扩大化.....	65
七、严重后果.....	68
第三章 “红雨随心翻作浪”	71
一、我还想恢复“多快好省”.....	71
二、“不尽长江滚滚来”.....	74
三、大炼钢铁.....	82
四、六亿神州尽舜尧.....	88
五、农村乌托邦.....	97
第四章 九个月降温	109
一、“做冷静的促进派”	109

二、唱个低调	113
三、停吹“共产”风	119
四、稳住阵地再前进	126
第五章 庐山的逆转	136
一、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	136
二、彭德怀的信和张闻天的发言	140
三、从责难到批判	146
四、对事,也要对人	149
五、“反右倾”	153
六、新的“跃进”高潮	159
七、困境	165
第六章 被迫的退却	170
一、“今后搞几年慢腾腾”	170
二、《紧急指示信》和《农业六十条》	174
三、一九六一年的调整	180
四、“必须退够”	184
五、摘帽和特赦	185
六、“神仙会”和甄别平反	189
七、“科学十四条”	193
八、教育的三个条例	202
九、文艺界的清风	210
第七章 走出困境	218
一、“伤筋动骨”	218
二、非常时期	222
三、脱帽加冕	228
四、文艺八条	236
五、党外关系的调整	240
六、“一揽子”解决	249
七、八字方针不要马上改变	250

第八章 从“吃穿用计划”到“三线建设”	258
一、要基本解决吃穿用	258
二、“吃穿用计划”	264
三、“拳头”和“屁股”要摆好	270
四、三线建设的开局	276
第九章 热风吹雨和冷眼向洋	279
一、从“蜜月”到分歧	279
二、波匈事件和莫斯科会议	285
三、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	293
四、第二次台海危机和中美关系	298
五、中印冲突和外交进展	305
六、从分歧走向破裂	310
第十章 政治体制的演化	318
一、局部改进及其失误	318
二、政治体制的某些调整	346
三、高度集中的体制结构的强化	364
第十一章 “正是神都有事时”	381
一、浮出水面的分歧	381
二、“要搞一万年阶级斗争”	385
三、两股道上跑车	391
四、“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395
五、“根子在上面”	400
六、“党内出了修正主义”	407
七、“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	411

第一章 走自己的路

一、序幕即将拉开

1956年1月15日,距农历春节差不多还有一个月,天安门广场却显得比春节还要热闹。首都数十万人举行集会,庆祝北京率先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随即,全国各大中城市也相继举行同样的集会,宣告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这件事情意味着,在中国大陆,大规模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序幕即将拉开。

中国全面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是在国内外形势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开始的。在国内,经过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已经建立起来,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时的物质基础还相当薄弱,经济、文化状况十分落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头七年,经济、科学、教育、文化等各项事业同旧中国相比有了巨大发展,但是上述的落后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因此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异常迫切而又艰巨。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所进行的各项建设,为即将开始的大规模全面建设打下了一定的底子,为人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正反两方面的重要经验;而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国人凝聚起更大的向心力并焕发出极大的建设热情,执政党和新政府的威望如日中天。这些又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利条件。

在国际上,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世界形势的发展也出现了新的

重大特点。首先是国际局势由紧张开始趋向和缓。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和印度支那战争的停火,国际关系的氛围已经有了显著的改变,越来越多的国家赞同和支持和平共处的原则。另一个大的特点是,世界范围内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尤其是出现了以原子能、电子和空间技术为中心的科学技术革命。以原子能的开发和利用为标志,人类开始了利用核能的新时代。新的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战后各国在完成经济恢复任务的基础上,调整产业结构,逐步建立起新的国际金融和贸易体系。这些变化,有利于中国的国内建设,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与此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举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尖锐地揭露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这在苏联国内和国际上都引起极大的震动。西方世界对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和社会主义的体制及政策,给予了强烈指责。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内部,特别是共产党、工人党执政的国家内部,党员、干部和人民思想上的震荡更加强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时面临巨大困难。

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从3月到4月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讨论苏共二十大及其影响。4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了一番话,认为对于苏共二十大的讨论,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什么教益。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说这个问题他几年前就开始考虑,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其实,过去我们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

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①

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并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章对斯大林的功劳作了充分肯定,对斯大林后期的错误进行了具体分析,对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给予积极评价,同时指出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待斯大林,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这就把对苏共二十大和斯大林的评价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了,成为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的一个契机。

在国内外的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刚刚进入社会主义的中国人民面临的重大课题,就是如何把握好这样的历史机遇,寻找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建设道路,尽快地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二、向现代科学进军

面对国内外的新形势和国家建设的新任务,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制定科学技术发展的长远规划,发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主要是进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各项社会改革,发展科学技术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还没有来得及摆到执政党和新政府工作的突出位置,但中共中央对于科学技术工作和知识分子问题却非常重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曾明确指出:革命需要知识分子,建设尤其需要知识分子;我们必须善于充分地利用旧社会培养的知识分子,使他们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服务,并继续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新的优秀科技干部,否则就很难完成繁重的经济建设任务。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的知识分子队伍逐渐壮大。据统计,从1949年到1955年,

^① 参见吴冷西著:《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9—10页。

中国各条战线的高级知识分子从六万多人增加到十万多人。其中,地质、重工业、石油、煤炭等行业的科技干部增加得相当快。他们各尽其责,发挥特长,为国家的各项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科技人才在数量上、质量上远不能满足大规模经济建设迅速发展的需要。这就要求一方面尽快培养国家建设所需要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发挥现有知识分子队伍的作用。但是当时党的一些干部对于科学技术和科技人员的重要性缺乏认识,甚至存在不尊重知识分子的严重的宗派主义倾向。毛泽东已经意识到这个方面的问题。他在1955年初指出: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的时候了,该抓了。这年3月中共召开全国代表会议,他进一步指出:

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是新问题: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新的国防、其他各方面的新的工作。适合这种新的情况钻进去,成为内行,这是我们的任务。^①

1955年11月22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第二天,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会议,商定召开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成立由周恩来负总责,彭真、陈毅、李维汉、周扬、胡乔木等参加的十人小组,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十人小组和各部门、各地区党委,对知识分子的状况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为会议的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

1956年1月14日到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区党委主要负责人,重要的科教文单位的中共党员负责干部共1279人参加。会议着重研究了加强党对知识分子和科学文化工作的领导以及妥善解决有关知识分子的工作安排和生活待遇等问

^①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395页。

题。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从党面临的任务说起,对整个知识分子队伍的现状包括他们的成长过程和政治思想、工作状态作了详细的分析。周恩来在报告中宣布:经过建国后六年来贯彻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①这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规定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对于知识分子问题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关系,周恩来作了一段精辟的论述:

我们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归根结底,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地增长,不断地改善。因此,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因此,我们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②

这个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和社会作用的估计和判断,奠定了社会主义时期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的基础。报告还指出:目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低估了知识界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的巨大进步,低估了他们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怎样才能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呢?周恩来中肯地提出三条指导原则:“第一,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 and 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第二,应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第三,应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2页。

② 同上,第159—160页。

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①

周恩来在报告中还着重谈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问题。他说：

我想在这里稍微多说一点科学方面的事情，这不但因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而且因为世界科学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这些最新的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我们必须赶上这个世界先进科学水平。我们要记住，当我们向前赶的时候，别人也在继续迅速地前进。因此我们必须在这个方面付出最紧张的劳动。^②

报告提议由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会同有关部门制订 1956—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的远景规划。

毛泽东在会议结束那天到会讲话，提出要搞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技术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他说，搞技术革命，没有科技人员不行，不能单靠我们这些大老粗，这一点要认识清楚，要向全体党员进行深入的教育。还说，中国国家大，人口多，资源丰富，地理位置好，应该建设成为世界上一个科学、文化、技术、工业各方面更好的国家；要培养大批知识分子，要有计划地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水平。^③

这次会议开得非常成功。会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在 2 月 24 日举行会议，按照周恩来的报告和毛泽东的讲话，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会议的召开和会议精神的传达在知识分子中引起很大的反响，给他们以极大的宽慰和鼓励，对党的干部是一次深刻的教育。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著名历史学家陈垣教授说：

周总理的报告说出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里话，指出了他们今后应当遵循的方向。广大知识分子今后要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加强自我改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168、169、170 页。

② 同上，第 181—182 页。

③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07 页。

造,积极进行科学技术和理论研究,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最大的力量。^①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召开的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和发展科学技术的一次历史性会议载入史册。它表明我国的知识分子工作有了良好的开端,它的重要作用和积极影响在以后的各项建设中逐步地显现出来。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以后,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积极投入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本职工作中。就党和政府这方面的工作来说,最重要的就是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订。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订,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涉及尖端科学技术领域和应用技术领域以及人才培养的诸多方面,需要集中大量人力、物力,靠大力协同才能完成。周恩来领导和主持了这个规划的制订。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提出制订科技发展的长远规划后,国务院就成立了由中国科学院和国务院有关部委办负责人组成的科学规划十人小组,进行具体的组织工作。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等在中南海怀仁堂专门听取中国科学院专家们的报告,了解我国科技工作的发展现状。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成立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决定陈毅任主任,李富春、薄一波、郭沫若、李四光任副主任,张劲夫任秘书长。为此,中央调集了600多名各个门类和学科的科学家,并请了近百名苏联专家参加规划编制的具体工作。在规划制订过程中,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提出“迎头赶上、重点发展”的指导方针,也就是既要瞄准世界的先进技术,又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保证重点。科学规划委员会多次举行不同类别的会议,充分听取各方面专家和有关部门的意见,对规划制订中的重大问题统一认识。

5月24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酒会,招待参加全国科学规划工作的300多名科学家,勉励大家努力开展科学研究,学习苏联和其他一切国家的科学技术,争取在12年内使我国重要的和急需的科学技术部门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他对曾留学西方的科学家说:

①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505页。

“我们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但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应该虚心学习。”^①

这年11月,因陈毅调外交战线工作,中共中央任命聂荣臻为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由科学规划委员会负责人陈毅、聂荣臻、李富春等具体组织,经过各方半年时间的共同努力,反复论证,12月编写出了《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的纲要(修正草案)》。这个规划共确定了13个方面、57项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和616个研究课题。在此基础上大家讨论确定了带有全局意义的12个重点项目,在人力、物力上予以优先保证。对某些特别重要而在我国却比较薄弱的环节,如计算机技术、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和远距离操纵技术等四项,加上不便于在当时公开的发展导弹和原子弹研究两项,采取紧急措施。

实践证明,这个规划是宏伟的,也是切实可行的,它成为全国人民向科学进军的行动纲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和12年科学规划的制订,使广大知识分子备感鼓舞,一个“向现代科学进军”的热潮在全国兴盛起来。在规划的指导下,广大科学工作者坚定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我国科技事业的信心和决心,积极努力地开展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科研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得到改善,科研经费有了增长。许多高科技如原子能、喷气技术、电子计算机、半导体和无线电技术等,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发展起来;一批新兴工业在中国成长起来,传统的科技领域有了进一步发展。到1962年,规划中的绝大多数科研项目都已完成,并运用于生产,7年时间基本完成了12年的工作量,解决了国家发展需要的科学技术难题,缩小了我国科学技术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到1962年,全国科研机构由381所发展到1296所,专业科技人员由18000余人增加到86000余人^②,初

^① 《人民日报》,1956年5月27日。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2—1213页。

步改善了原来科技力量薄弱的状况,为以后我国科学技术和国家各项事业的继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苏联的弯路,你还想走?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自己建设道路的探索,实际上从苏共二十大之前就已经开始了。1955年12月至1956年春夏,为准备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进行了执政以来的第一次大型调查研究工作。先是刘少奇为准备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从1955年12月到1956年3月,分别听取中央30几个部门的汇报。接着,毛泽东从1956年2月中旬至4月下旬,也分别听取国务院34个部委关于工业生产和整个经济工作的汇报。4月25日,根据这些调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得到中央政治局的赞同后,5月2日又向最高国务会议作了报告,对“十大关系”作进一步的阐述。

《论十大关系》的报告确定了一个基本方针,就是把国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报告所论述的十大关系,一方面是从总结我国经验、研究我国建设发展的提出来的,另一方面也是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提出来的。报告强调:对于外国的经验,既不能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也不能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要打破迷信,不管中国迷信还是外国迷信。我们的后代也要打破对我们的迷信”^①。

在报告中毛泽东明确指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②

^①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历史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84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0—721页。

“十大关系”主要讨论经济问题。这反映了在新的形势下,党的领导人在分析国内社会矛盾全局的时候,已经把经济建设中的矛盾摆在首要的中心的地位。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十个方面的关系。

关于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报告首先肯定,过去在处理这方面关系上,没有犯多大的错误,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做得好些。同时强调,我们当前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这样,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报告说,发展重工业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会使它的基础更加稳固。

关于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报告指出,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在这两者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也没有犯大的错误,只是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对它的发展不那么十分注重了。过去朝鲜在打仗,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现在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支持和发展内地工业。

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报告说,经过抗美援朝战争和几年的整训,我们的军队加强了,装备也有所改进。今后如何发展?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国防建设才能有更大的发展。

关于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报告提出,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报告还提出了工厂在统一领

导下的独立性问题,指出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

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报告指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报告还说,还有一个地方和地方的关系,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的积极性,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框得太死。

除了上面这五个方面的关系,报告还讲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关系。这些是属于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方面的问题。

关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报告指出,鉴于苏联在处理俄罗斯民族与其他民族关系上的教训,我们应该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巩固各民族的团结。对党和非党的关系,提出了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关于对待反革命分子,报告在肯定过去搞镇反、肃反的必要性的前提下,估计现在“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提出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和机关内部清查反革命分子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这年7月,周恩来在中共上海市代表大会上强调:“现在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应该是: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①关于处理党内矛盾,报告重申延安以来实行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赞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关于中国和外国关系,报告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包括学习资本

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不久以后,周恩来也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那是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①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总结讲话中,毛泽东还提出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随即,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了这一方针。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代表中共中央向知识界、文化界、科学界阐明了这个方针,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这是人民内部的自由,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领域中的表现。^②

这年6月,中国共产党还提出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实现祖国完全统一。6月28日,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周恩来还指出:“为了我们伟大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曾经两度并肩作战,反对帝国主义。……尽管这些年来,由于美国的武装干涉,我们和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是,只要大家以民族和祖国的利益为重,我们仍然可以重新携手团结起来。”^③这就发出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合作的倡议。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正式表示: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08页。

② 《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01—504页。

③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02页。